

长期以来,提起建党史,人们津津乐道的多是陈独秀、李大钊等党的重要创始人,而对诸如李书城、谭平山、李季等人在建党中的作用和贡献了解甚少。

建党史上不应被遗忘的3位功臣



▲谭平山

谭平山:与李大钊陈独秀齐名

谭平山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转入国民党,并被选为广东省参议员。在中共的早期党员中,他最早提出政党问题并阐述了政党内涵。

1920年,谭平山与陈独秀等联络,在粤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广州共产党支部建立时,谭平山成为首任书记。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时,他因事未能出席而让陈公博做代表赴沪。1922年“五一”节,他发动广州10万工人群众举行大游行,本人举着红旗走在队伍最前面。当时,中共党内有“南谭(平山)、北李(大钊)、中陈(独秀)”之说。

1924年,国民党进行改组,谭平山因有同盟会员资格、是广东名流并有共产党推荐等多重优势,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1927年夏,他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并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团的实际主席;南昌起义失败后,谭平山被迫流落港澳。在此期间,武汉国民党中央宣布开除谭平山的国民党党籍。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也将谭平山直接开除党籍。后来,周恩来曾回忆说:“谭平山被开除党籍的原因,是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谭平山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后来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就决定把谭平山开除了。”

此后,谭平山发起组织第三党,1948年初参与创建民革。新中国成立后,谭平山被任命为政务院政务委员、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直到1956年病逝于北京。

李季:翻译作品影响毛泽东

李季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1920年参与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15名成员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他主要埋头翻译海外社会主义思潮论著,著名的《社会主义史》就是他翻译的。

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季遭遇了社会主义思潮。为弄清楚风行国际的社会主义思潮之来龙去脉,他开始着手翻

译《社会主义史》。在社会主义知识荒的当时,《社会主义史》在勾勒社会主义发展史方面功不可没。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和斯诺谈话时曾说,他在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等书之后,“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足以表明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在当时的震撼力。

党的一大召开时,李季因忙于办理出国留学事务未能参加。1922年,李季与朱德一起留学德国,后赴苏联学习。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已回国的李季参加了托派组织,1929年被开除党籍。1950年,李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声明,检讨了自己托派的错误。

李季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国家出版总署特约翻译,1967年2月在上海去世。

李书城:中共一大在他家召开

李书城是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反清将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驱、辛亥革命的元勋和武昌首义的元戎。建党之初,李书城毫不犹豫地将寓所变成中共早期组织的活动中心。他的弟弟、上海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李汉俊,就是以李公馆为中心向国内传输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资讯。李书城则以举家之财力支持中共早期组织的活动。

在李书城对于中共早期组织种

种掩护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关于中共一大会场被搜查”的问题。通常说法是:1921年7月30日晚,一陌生人冲进法租界李书城寓所——中共一大会场,随即匆匆离去。十几分钟后,一批法国巡捕和中国密探搜查了这所房子,这时会议代表已安全撤离,两天后在嘉兴南湖继续举行会议。

当年,法租界警察确实搜查了中共一大会场,但只是履行了搜查程序,而对于至关重要会场散落的文件,警察们并没有翻动;对于楼上卧室均未作任何搜查,甚至连房门都未要求打开。巡捕走后即至李家的“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说,李汉俊当时向他这样讲:“巡捕们搜查得很马虎,写字台抽屉内有一份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没有来得及收检,他们竟没有发现。”当时倘若没有李书城的政治声望和影响力,中共一大会场被搜查的后果是难以预料的。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李书城之侄李声簧(中共党员)与他建立联系。1948年,李书城敦促白崇禧与中共和谈,逼迫蒋介石下野,后赴湖南劝说老学弟程潜起义,给予蒋介石、白崇禧之流以有力打击。并且,他还秘密前往解放区与刘伯承、陈毅进行了关于和平解放湖北的谈判。

新中国成立后,李书城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出任中央人民政府首任农业部长,1965年病逝于北京。

(据《北京日报》、《文史天地》)

陈云曾出任中组部部长:党员从4万发展到121万

1937年11月至1944年3月,陈云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把马列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党的建设方面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和观点,做出了不少科学的决策,在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方面起了关键性作用,使党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1937年11月29日,32岁的陈云同王明、康生一道乘飞机从苏联回国到达延安。这时,陕北的天气已经变得很冷,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冒着寒风到机场迎接。毛泽东神采奕奕,满脸笑容,走上去和他们一一拥抱,互致问候。陈云特地把大皮帽摘下来,给毛泽东戴上,自己换成布棉帽。王明、康生、陈云穿着黑色马裤、长筒马靴,跟延安的服装不一样,看着特别高大,特别有精神。毛泽东致欢迎词,用浓重的湖南方言说:“喜从天降。”在说这句话的同时,把帽子抛得高高的,抛到空中,接下来又说:“喜从天降。”不断地重复,大概有三四次重复,还说:“是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

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讨论抗战形势和党的任务。会议根据形

势发展的变化,对各地的工作重新作出部署,对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也进行了调整。由于博古同王明、周恩来、董必武等被派往武汉长江局工作,会议决定由陈云接替博古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富春任副部长。

陈云接手中央组织部工作时,全党只有4万党员,同当时形势的需要很不适应。他上任不久,就提出要面向全国理顺组织机构。在他的努力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体系,由中央局、分局、省市委构成,根据地推到什么地方,组织建设、组织机构就跟到什么地方。

1938年3月,陈云组织起草了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的任务,强大的党的组织是必要的。但应该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因此大量的上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决议还指出,党内在发展党员问题上要打破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关门主义倾向;另一种是在统一战线中忽视

党的发展,以为党的扩大无足轻重,甚至于取消党的发展的倾向。决议要求,把发展党员作为每一个党员及各级党组织的经常的重要的工作之一。

陈云认为,中央组织部在党的组织工作上,不仅要面向延安、陕甘宁边区,而且要面向全国各个敌后根据地,面向国统区、敌占区的党组织。他要求中央组织部要建立相应的机构,确定人员,来尽量了解各方面党组织的工作情况,以便制订不同的政策,进行有针对性的领导。建议立即得到中央的批准,成为了中央组织部的指导方针。陈云还适时地提出建议,协助中央制定了一系列适用于不同地区的组织工作方针政策。

关于根据地,陈云提出“发展、巩固,再发展、再巩固”的方针,主张既要抓党员的数量,又要抓党员的质量。

关于国民党统治区,陈云提出要警惕国民党“反水”,要执行“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党内小党外大”的方针,既要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又要学会保护自己。陈云主张打破国统区“中上层分子都不好”的旧传统观念,把统一战线工作重点放在中上层人士身上。

关于敌占区,陈云创造性地提出

“除了本身精干以外,领导机关要放在外头”的新方针,就是将领导机关放在离根据地近一点的地方,在外面指挥,以避免领导机关一被破坏就导致白区工作的瘫痪。把“领导机关放在外头”的主张,适合敌占区的情况,既便于保存我们的力量,又能及时做好敌占区党的工作。后来,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后,蒋介石公开地进行反共,这一方针得到继续执行。

上述切合实际又有极强操作性的方针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扩大了统一战线,有效地促进了党组织的迅猛发展。到1938年底,党的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全国的党员人数从4万多增加到50多万。

1943年,陈云因过度疲劳,经诊断患了心脏病。3月,中央书记处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他休养一段时间。

在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陈云坚持用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思想统领组织工作的全局,使我们党的力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至党的七大召开时,我们党的党员人数已由1937年的4万余人发展到121万,干部人数也由3万余人发展到了40万左右。

(据《湘潮》)